

从文化和哲学认识论的视角 分析当前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深层问题

■ 溪源

面对全球化的大趋势,我们在政治、经济、法律、军事、艺术等众多方面要深化改革,将不可回避地面临诸多方面的判断与抉择,尤其在未来全球合作治理模式的探索过程中,文化对经济制度的诠释力和话语权的确立将直接地影响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环境。因此,从文化和哲学认识论的角度来思考和审视改革开放中遇到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来认清全球化的趋势和规律,并结合国情实际,大力加强软实力建设十分必要。

本文尝试从上述角度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范畴来解读和探索当前经济领域面临的一些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以期对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起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理解和借鉴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十分必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且不少问题也让西方经济学家感到困惑,尤其在西方经济出现问题时,一些西方的大师们还寄未来经济学的希望于中国;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至今仍无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国内不少学者谈经济问题,依然是言必称希腊。同时我们还看到西方经济学自身的不同学派也观点不一,甚至出现左的更左,右的更右的现象。因此从当前看经济学的理论问题,似乎大家都有一些找不到北的感觉。那么到底怎么看这些现象呢?应该讲这和我们今后的深化改革密切相关,如果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和探究这个问题,也许可以提供一种思路或者答案。

现实中,经常遇到西方的许多经济学理论或者企业的规章制度我们学不来、无法学,或者常有南橘北枳的情况。这实际上正说明任何制度的产生、设计和有效运转都是离不开文化的诠释和支撑的。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的制度首先需要认识其文化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客观看待从西方引进的政治、经济等领域的诸多概念及其本质。众所周知,希腊时期形成的系统的形式逻辑是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之一,也是构成其启蒙运动时期科学理性思维的主要内容,基督教的契约观念又为其提供了法治的伦理基础。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一方面与培根的实验方法结合,导致不断地一分为二,不停地寻找客观物质的最小单元;另一方面则是讲究对任何问题的是非必须用定义来规范进而形成概念,要求语言表达和制度制定也必须严格符合形式逻辑,并在概念清晰的基础上,用还原论的方法不断地通过形式逻辑来构建其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法律等大厦。但是我们需要看到这种从个别到一般抽象而成的概念,对个别来讲已经是丢掉了不少客观实在及其联系的条件和信息,而还原论导致的从个体或者一般的概念出发,再用形式逻辑的线性思维来推理和建立整个社会经济的复杂系统的治理和发展模式时,必然导致全社会的法律、财政、税收和企业管理制度体系呈现越来越复杂的趋势,当系统复杂到一定的程度,则出现原来的假设、概念、模型或参数越来越脱离社会经济系统的现实,其应用到现实中则



必然出现蝴蝶效应而导致系统性危机。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就是这个问题的具体反映。而这里综合反映出来的概念加形式逻辑的无限推理和应用后出现的问题,其根源正如东方哲人老子指出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经》第一章)、“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知止可以不殆”(《道德经》第三十二章),这几句话深刻地指出了凡是为了人类自身方便而制定的名词概念,由于其本身已经加入了人的主观因素,因此其使用范围必然是有限、有条件的。使用其构筑的理论要应用就必须联系自身的实际,这是我们使用、借鉴西方理论必须清醒把握的一个重要的认识论基础。而当前西方经济学应用中出现的问题也正是忽略了这个问题的,这和他们分析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和思维方式有直接的关系。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11 年国情咨文中表示:“世界已发生了变革,尽管在过去几年遭受到了巨大打击,但美国仍是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经济体……而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是首个以思想立国的国家,这个思想是每个美国人……都会提出‘你认为这个想法如何?你想知道如何改变世界?当你长大后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段看似简单的话,但是作为国家的立国思想突出个人和自我本位就有非常特别的导向性了。这与我们“道之将行,天下为公”,立足于事物整体和事物间普遍联系的的东方文化是很不一样的!西方文化中的分析哲学、抽象思维决定了他们必然一切从清晰的个体、自我、产权出发,以抽象的概念、抽象的数字、抽象的时间、抽象货币加上形式逻辑来构建他们社会的经济、法律乃至政治制度。这种还原论的认识论既是他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其经济、法律、政治、哲学渐现弊端的由来。正如英国女王伊丽沙白二世寻找经济危机根源的答案——每个人都忽视了系统性风险(Systemic Risk)一样,如果我们从文化哲学的视角观察就能发现正是由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缺失宏观整体的辩证思维才导致经济系统不平衡危机的出现。因为他们经济学体系的基础就是从人为假设的微观概念或者公理出发再用形式逻辑来推演的,因此他们认为可以在个体或局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实现市场宏观与经济

整体的一般均衡,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复杂开放的经济巨系统,整体绝非等于局部的线性叠加。因此西方经济危机的出现实质上已经深刻地暴露了其主流经济学家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的谬误!

那么,我们的文化与之相比又有什么特点呢?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比较中呈现出不少相反相成的现象,而且恰恰又选择了从否定西方的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诞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又说明什么呢?无疑需要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来探索这种与政治、经济、法律制度 and 人的思维行为方式密切相关,而又在深层次起决定作用的文化哲学认识论问题。

二、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比较中来把握全球化过程的一般规律

老子《道德经》中有“执大象、天下往”的话,意思是“抓住了最根本的规律以后,就能够判断天下发展的趋势”。通过对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比较、区别、联系,我们会看到许多互补乃至相反的现象,不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需要我们从宏观规律的角度来审视和把握的问题!

比如有经济学学者提出:中国和美国的经济模式是两个极端的模式,美国是“市场内国家”,而中国是“政府内市场”。就是讲,在美国,如果市场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政府失去对市场的规制,那么经济危机就必然发生。相反,在中国,如果政府占据了完全的主导地位,而市场完全被政府所控制,官僚化则将使市场失去了生机与活力,那么经济危机也就必然发生。如果美国的经济危机出在华尔街,那么中国的危机则必然出在国有企业。这些显得很对偶,但也确是有依据和道理的。

在金钱与权力关系的历史看,美国是金钱支配权力,而中国历来是权力支配金钱;美国的政治哲学以讲权利、讲法律为主,也讲道德。而中国的传统政治哲学则以讲义务、讲道德为主,也讲制度和法律。我们以前批评人家是帝国主义扩张、自由资本主义造成经济危机;而现在人家则抨击我们是专制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美国人重消费,中国人重储蓄,人家实行直接税为主,我们还只能实行以间接税为主,这里面的一系列对称、相反难道仅仅是偶然的

吗?

再从产业经济看,目前,中国产业整体上仍处于工业经济时代,而美国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两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出明显的互补性特征。这种互补性是在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三个层次都广泛地存在。

如果要专门找这方面有趣的对称、对待、互补的问题就更多了,乃至东西方的语义都充满辩证的统一。诸如美国学界的左派自由主义对于中国而言恰恰是右派,其右派恰是我们的左派,连我们地名的书写顺序都和人家相反,为什么会这么巧呢?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意象思维(相对西方的抽象思维)来看,这里面实际上已经生动而深刻地体现了从思维、行为到制度和经济结构的对立统一关系,两者已经构成了“阴阳”即“矛盾”关系,也即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这种状况的出现具有极其深刻的客观规律的规定性。1974 年 5 月 30 日毛泽东主席会见物理学家李政道时就体现他非常重视对称在物理和政治中的含义。当时李政道以笔尖转过来转过去来演示,并指出“这运动没有一刻静止,但这整个过程却具有对称性。”毛主席非常欣赏这种演示,并且问到对称的更深含义,问到物理学家能否仅仅根据对称性原理真正描述出普遍规律(《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第 360 页)。北宋哲学家张载也曾经深刻地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则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因此辨别和认识到这种具有对称意义的“阴阳”、“矛盾”及其双方的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与互相转化的关系规律,以唯物辩证法为工具来分析未来中美(东西)关系乃至全球化问题的趋势,并积极主动地促进其朝有利于我们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转化就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战略指导意义。

本报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启动

为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本报拟在“2013·中国经济学人”评选活动基础上举办第二届“(2014)中国经济学人”评选,自2014年11月2日起正式启动。参评者应具备以下几个基本条件:其理论具有原创性、实践性、时效性、前瞻性和首发性;在本报至少发表过一篇论文;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欢迎具备条件者踊跃

经济学家周报“2014·经济学人评选”基本规则

- 成为“经济学人”的基本条件是:
其一,原创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其二,理论实践性强,甚具可操作性;其三,应用时效性强,社会影响力广泛而深远。
- 本评选系整体评价个别“经济学人”,而不只是哪一(几)部(篇)论著或哪一(几)个别观点、论点。
- 关照各个学术流派,各个领域。学者:老、中、小兼顾,文论:长、中、短皆宜。
- 不搞“终身制”,一年一届;随时上车,随时下车。
- 本次评选纯系公益活动,不收任何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圆晨	范恒山	樊 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 康	江春泽	金 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京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 伟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 杰	吴 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启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上述分析可能有不少人会认为是牵强附会,那么我们注意到当年管子在国家管理中总结的七种方法“则、象、法、化、决塞、心术、计数”(《管子·七法》)中就包括“象”,这是为了处理作为复杂系统的国家宏观战略事务时具有我们民族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这七法中的“象”(《管子》一书中具体解析为“……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这就是应用我们传统文化中的观物取象和立象取意的意象思维方法。在我国传统的文化经典和著名学者中有大量的关于“象”的描述。如“天地阴阳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素问·五运行大论》)。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中指出:“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象之所包广矣,非徒《易》而已,六艺莫不兼之”。我们还注意到钱学森同志晚年十分强调:“我们要多宣传这样一个观点,科学技术工作决不能局限于抽象思维的归纳推理法,即所谓‘科学方法’而必须兼用形象思维或直感思维”(《关于思维科学》第 2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所以这种形(意)象(系统)思维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体现在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有其重要的认识论价值的。在我们传统优秀文化的精华中医理论中,就强调“察色按脉、先辨阴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上医医国”(唐·孙思邈),“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对老祖宗的这套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全球化的今天应该给予更加深入的研究和重视,并从实践中不断不断丰富并加深认识,以做到“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道德经·道经第十四章》)。

(下转 02 版)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49 战略圆桌”活动跨界专家云集

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经济学和文化创意产业发展

■ 李波

结合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关于继承历史文化遗产重要讲话精神,新设立不到两年的民间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以及“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日前在北京民族饭店联手举办了主题为“‘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2049 战略圆桌”活动。学者、专家聚会一堂,围绕在中国文化复兴与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历史新传统,如何更好把握中华文化基因、提炼传统文化精神,如何打造国家形象的全局品牌,如何打造中国气派的国家经济学,如何推动文化创意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决策科学院院长、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经济学家周报》主编管益忻教授应邀以《儒商文化与资源配置》嘉宾主题发言。曾教授指出,资源配置实际有多个层次,历来的经济学“单打一”强调效率层面,忽视了文

化和价值观等在资源配置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极其错误的。也正因此,便往往忽视了以责任为中心的商业文明;企业片面以利润为中心运行的结果是严重地阉割了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扼杀了“劳动与创造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整个文化在产业、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发展、建设中的地位问题,曾教授为参会者精辟地阐述了他的“三元文化底色理论”——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主导,以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学说为主体,以西方时代文明精华为参照系的文化发展基点理论。曾教授强调,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也有强调无限责任的积极意义的观点,引发到会者的强烈关注。

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就《中国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形象打造》主题发言,指出国家形象的打造是一项凝聚内部共识、减少外部发展阻力的重大软实力建设工程,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有的“和而不同”、“天下为公”、

“国虽大好事必亡”等政治哲学观点及其内涵,将有助于减少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后国际社会产生的各种焦虑,基于传统价值观提炼而来的“软实力”文化有助于中国的国家形象全球传播、有助于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智刃无锋,何以大国争锋?”王辉耀会长指出,在国家形象打造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国际传播中,民间智库必须发挥、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黄剑辉就《先秦诸子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及新供给经济学的创立与发展》主题。黄院长指出,战国时代以《管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思想在市场调控与干预、国际贸易、合理财政、以盐铁专卖减轻老百姓的税赋等方面领先西方经济学多年。今天世界再次发展到类似战国时代群雄并列的大格局,中国做为新兴大国登上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的中心,诞生中国气派的国家经济学的时刻来临,古为今用、融合东西是华夏新供给经济学智库的主张,以克服西方主流经济学模型

的明显缺陷、在伟大的实践中推动中国经济学思想创新。

与黄院长相呼应,梅花与牡丹书院(筹备)院长李波博士就《儒家传统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溯源》主题发言,首次介绍了自己对于儒家思想传统扬弃采用的“理想儒家、实用儒家、革命儒家、保守儒家”四分法,同时指出,儒家社会主义理念不仅仅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道德,而是一种实用社会政策实施与严肃思考的结果、针对秦汉农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序发展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社会崩溃严重问题。李博士还比较了西欧发源的针对工业资本主义无序发展恶果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潮/价值观与儒家社会主义在传播、组织模式上的不同形态,并且归结到基督教文化模式的影响。

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姚余栋博士发言首先从就业率在各个国家一般随着 GDP 发展出现的下降普遍趋势开始,用详尽数据预测说明演绎了面临老龄化的中国社会的就业率未来走向和对于经济发展负面因

素。做为对策,姚博士从中华文化牡丹与梅花双基因模型出发,解释了新加坡就业率数据的“反常”,将牡丹的多元创新精神和社会的创业率提升相联系,将梅花的吃苦耐劳精神与就业率提升相联系,指出唯有发挥文化传统精神,才有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以责任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对于西方的商业文化是同样适用的。鉴于此,上海某基金总经理王翔先生在《从全球大家族看文化与商业的关系》的发言中,讲述了一百多年以来美国杜邦家族、洛克菲勒等家族通过强调道德价值观、社会责任回报、低调做人家风、和政治权力保持适度关系等文化因素,保持了家族社会影响力的经典故事。

关于传统文化精华因素的现代应用论题,大公国际首席风控官金海年先生和参与本次北京 APEC 领导人服装设计团队的杰出青年服装设计师楚艳,分别就《中国元素的文化创意走向世界》和《走向世界的中国华服设计思路》主题发表了精彩演讲。